

1980 年代以來的大陸女權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 黃盈盈主講，於 20151208 中央大學甯應斌課堂

黃盈盈：說明一下，如果講到中間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插進來問，像李雪、艾可也是對大陸的情況蠻熟悉的，可以隨時加進來討論。女權主義、婦女／性別研究，這些概念本身就是可以討論的。

我今天大概是想簡單梳理一下 1980 年代以來，也就是近 30 年來，性別議題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幾個階段。每個階段各自有一些關心的議題，還有一些爭論點，包括背後的社會背景，大概就是做這樣的脈絡梳理。為什麼要介紹 1980 年代以來呢？其實我們不能只看到非常現代的、當下的東西，太遠的我可能追溯不到，甚至五四之前對我來說可能都有一點距離，但是至少這 30 年來，那麼短的距離，我還可以試著去追溯一下，而不是僅僅關注眼前發生什麼事情。我覺得歷史還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正好趁著這個機會自己梳理一下。

當然也是因為有契機。在大陸有兩個時間點，一個是 2008 年，是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 30 年，學術界和其他一些行業寫了一堆回顧，看看自己 30 年來做了什麼，其中也包括婦女／性別研究。另外一個契機是今年 2015 年，也就是北京世界婦女大會 20 年，又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寫文章回顧這 20 年婦女／性別議題的發展，我覺得這也蠻好的。我是性社會學的，性別會議一般都不會叫我去，但是我覺得性跟性別本身非常緊密相關，就像 Rubin 說的，我在研究性的議題時撇不開性別的議題。只是說大家對於性別這個概念的理解會不太一樣，比如說你是不是把多元的性別、其他的性別納入進來？你如何看待性的問題？可能具體會有不一樣？但是性跟性別之間的關係是撇不開的。雖然別人說，「欸，你做性研究的，幹嘛來講性別？」但是我覺得放在一起看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學社會學的，1999 年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性別研究是挺活躍的分支。李小江、王政這幾位老師在大陸引介或是討論了很多性別相關的東西，包括有一些概念方面的爭議，所以 1990 年代末期以後我作為學生閱讀了一些她們當時的著作，也大概知道當時有什麼樣的爭論點。後來我開始做性研究，關注比較多的是性工作的議題，那時候女性主義在這個議題上的討論很少。2000 年以後大批愛滋病項目隨著國際項目進來，它也帶進來在愛滋病項目中貫徹社會性別的視角，也就是愛滋病當時成了性別主流化的一個領域。在這塊，我參與的比較多一點，就是跟那些公共衛生的人討論社會性別這個議題，所以 2005 年世婦會之後健康和性別這個方面我有參加，跟不同領域的人打過一些交道。在國際項目的推動下，Gender and development 這樣的議題在 2000 年以後其實是非常受關注的。

我自己做的更多是性工作者的研究，尤其是女性性工作者的議題，從 1999 年一直到現

在都在關注。不單是學術，和性工作的草根組織也有所接觸，所以這個議題我自己體會比較深一點，當然這個議題你也撇不開一些性別的討論與爭論，這跟我自己的學習興趣以及當時參加一些項目的背景也有一定的關聯。

就歷史脈絡而言，我略作一點承上啟下。1980 年代之前，當時有兩個時段蠻重要的。一個是五四前後，就是 20 世紀初，當時是在強國文明進步話語下的女權主義。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因為女權主義這個詞曾經在 1980、1990 年代在翻譯過程中有過爭議，有些人覺得要叫女性主義，不要叫女權主義，最近青年女權的行動又把女權主義這個詞比較顯性的帶出來了。有的人也會說：其實這不是個新詞，在五四的時候就有人用了女權主義，學界也開始重新討論五四時期的女權主義。當然現在有些研究追溯到更早了，包括宋代的，甚至班超的思想。這就不提了。但是五四的那個 20 世紀初的女權主義的背景，跟西方的對照性是蠻強的。我看到大家有讀那篇《女界鐘》，包括與西方的對照，與傳統的決裂，我覺得大部分的時候是決裂，就當時西方和傳統這樣的話語在 20 世紀初女權主義的發展裡是挺重要的背景。當然對於那時候的女權主義思想，現在也有爭議，比如：當時是不是男性主導下的女權主義？男性菁英發起的女權主義？是不是真的女權主義？等等。這類爭論到現在依然還在，就是到底是不是女性自己發起的女權主義。

當然跟歷史有關的議題也比較多元。比如閨秀詩文、墓碑文，還有一些對纏足的研究，大家可能都很清楚。還有對妓女的研究，尤其是對 20 世紀初的上海妓女的研究是個熱門。現在網路上傳的也蠻廣的，就是對於底層婦女的關注，包括歷史上的底層婦女，明清以來的、宋代以來的底層婦女。有一個說法是說「從閨房走到街頭空間」。比如說像是程為坤的《勞作的女人：20 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就是最近出來的一本書，在微信圈傳得挺廣的……

甯應斌：我打個岔。看到纏足、閨秀詩文、碑文啊，現場可能有些人一下子搞不清楚那個脈絡是什麼。在五四階段，反傳統採取了強烈對照的模式，把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跟帝制的時代，形成一對強烈的「光明與黑暗」對比。既然要反傳統，那麼在傳統之下的婦女就徹底被描寫成沒有能動性、被壓迫的，被寫成屬於黑暗的、沒有自己任何聲音的歷史。所以現在去做閨秀詩、才女、纏足的相關研究，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想要翻案，要告訴你傳統社會裡並不是像我們在革命話語裡所描述的一片黑暗，並不是這樣子。比方說，纏足這個實踐常常被當作是中國婦女被壓迫到極點的象徵，但是研究者要反過來說，並不是這樣子的，事實上這是當時女性自己的實踐，有點類似現在很多女性主動去做整形豐胸之類的實踐。總而言之，就是要翻過來講，過去社會的女人並不都是完全缺乏能動性。你們這樣想吧，如果整個傳統時期婦女完全是受壓迫狀態的，那婦女一定沒有參與到歷史建構的過程裡面，歷史裡應該沒有女性，對不對？因為她是最底層的，最無力的。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所以研究者想要回過頭去書寫婦女史、性別史。換句話說，從性別研究的視角去寫婦女史。

黃盈盈：對。這個岔很好，因為它提醒我最近又有一個爭論跟這個點是有關係的。有一個男的，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他寫了一個跟纏足有關的文章，我具體忘了他用詞是什

麼，意思就是說有些女人不是被迫地纏足，然後引起了一大批的反駁。所以纏足不光是個歷史議題，也是個當下的議題，是最近的爭論點。涉及女性有沒有自主性，還是制度壓迫下的產物，類似的爭論現在也還在延續。很多歷史學者在研究纏足的問題，包括高彥頤在書裡寫到，當時在革命的氣息下要「放足」，因為這是對女性的壓迫，所以當時成立了很多的「天足會」，也就是把腳自然放開。甚至動用軍隊去找那些裹腳的婦女，強迫她們放開腳，所以這又變成另外一種壓迫。山西閻錫山當時有一個很大的運動，就是到處找這些婦女，逼迫她們放足，要不然你就是不革命，不先進，你依然代表傳統的勢力。當時很多老太太躲到山洞裡，躲誰啊？就是躲閻錫山的軍隊抓她們去放足，所以這個議題事實上是有挺多討論的。

很多人對於 20 世紀初上海的妓女情有獨鍾，包括大家看過的賀蕭的文章，還有安克強的...我不知道法文是哪個詞，忘記了。還有前兩年葉凱蒂的《上海·愛》也翻譯過來了，等等。這些都是現在學術界對女性史的討論。

1950 年代社會主義時期，當時的性別平等政策到底是不是一種平等，有沒有個人的平等，還是國家的一種強制性的東西，這是一個爭論點，涉及如何理解國家主義背景之下的婦女解放。在社會主義建設背景之下，比較多的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那一派的體系。當時毛澤東有個很重要的口號：「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這是一個被廣為傳播的口號，「女人能頂半邊天」。1980 年代後，質疑的聲音開始出現，說這種抹殺差異能不能叫作平等？是不是平等？所以 1980 年代有相當一批研究者爭論：我們要平等，是不是說大家都一樣，都穿藍衣服，都穿成那樣，然後你幹多少活，我也幹多少活？有人寫了文章〈「鐵姑娘」再思考〉，鐵姑娘就是當時被宣傳的那種模範樣子，1980 年代就提出了再思考，再重新去看這個到底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那種平等？這到底叫不叫婦女解放？1980 年代之後不少人重新去看 1950 年代的男女平等。賀蕭新寫的一本書在大陸知識界也有一些人討論，就是關於「劳模」的研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樹立了很多的模範，其中也包括婦女勞動模範。她的研究不是說完全關注在「能動性」，而是去聽她們的說話裡面透露的是怎樣的一種敘事。我記得她主要的結論是，她們的那一套敘事撇不開國家的話語體系。那你怎麼跟她們說她們出來的都是那套國家的話語體系？賀蕭在方法論上提到，那麼到底有沒有可能聽到婦女的聲音？或者是那類話語是不是女性自己的聲音？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挖掘女性的所謂「自主性」的聲音？還是說那也是自主性的一個部分？我印象中有這樣的一些口述史方法論的討論。你一問她，出來的都是國家話語.....當然我個人理解是這跟她是老外的身份很有關係，雖然她找本地的高小賢老師跟她一起去訪談，但是妳去問一個中國婦女問「欸那個時候妳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其實中國人可能都知道那時候表態文化馬上就出來了，或者說它是一種直覺反應，不同的人去訪談，她的回應是不一樣的，因此只是靠訪談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方法論上是可以再討論的。

到 1980、1990 年代初，有一個改革開放的背景，有個很強的市場化轉向。在市場化轉向加強的時候，個體的差異性這些東西就開始起來，婦女研究開始興起，剛開始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婦女學，強調的是女性意識與性別視角，討論的另一個重點是市場化過程中的「女性問題」。那麼，當時有什麼樣的女性問題？其中兩個點是討論得比較

多的，一個是中國婦女比較廣泛的生存狀況，包括就業；還有一個就是家庭方面的議題。

這個時候婦女研究主要是在學界，或者說即便它是婦聯系統發起的，但是跟學界的關係還是比較強的，有兩類研究比較多，不是沒有其他研究，而是比較多的是兩類研究，一類是歷史、文學方面的研究，很強調重新在歷史中發現女性的聲音，就是女性意識，歷史、文學中被忽略的“女性”要把她們重新找出來，當時比較有名的有天津做歷史研究的杜芳琴，主要做古代婦女史，她的女兒蔡一平也是做性別議題的。李小江老師在 1990 年代主編了《性別與中國》系列，影響力蠻大的。1992 年她開始做 20 世紀中國婦女的口述史，那本書的副標題就表達了她們想做的事情——讓女人自己說話。在歷史中、文學中找到女人的聲音，這個是當時比較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類就是社會學的研究。社會學的研究比較多的是關注市場化背景下的婦女問題，甚至真的就是「問題」。什麼樣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剛才說的生存狀況，還有一個就是打工妹。改革開放之前，流動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們有戶口制度，當時你如果想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你是需要批准的，就是這個意思，不是自由流動的。而改革開放之後，其中一個很大的社會變化就是流動的自由，帶來了非常大的變化，農民工這一類的議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出現的，所以當時受到關注的一個點就是打工妹。研究這個領域有名的一個老師叫譚深，大家可能不知道，她是非常低調做事情的一個人，但是在九幾年代初她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關注深圳女工打工妹的生存狀況，包括她們的權益問題。1996 年在她和其他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打工妹之家」，那是一個新的民間小組，還不是一個正式的 NGO，但是在 1990 年代打工妹是女性研究的一個主要關注點。

社會學領域還有一個與性別相關的重點就是家庭角色的問題，包括我們現在說的男主外、女主內，應該如何分工，該怎麼去看待家庭勞動的價值。這一類的議題也成為焦點，還有女職工的生育補償問題等等也有討論。但是我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在 1994 年以及後面一整年的時間裡，婦女研究性別領域有一場跟外界的互動，社會影響力挺大，就是討論婦女回家的問題。1994 年在《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是我們社會學界被認為是最好的雜誌）上發表了相當多的文章，爭論「婦女回家」的問題，很多社會學家有參與，男的女的社會學家都參與，不是社會學的研究者也在爭論這個問題，而且基本上是吵架，真的是吵架。大家可想而知，一個聲音就是婦女要回家，一個就是反駁說婦女為什麼要回家。這個是 1990 年代引起社會轟動的大爭論，有幾個知名男社會學家當時也是被罵得挺慘的。

婦女與農村發展也是一個議題。農村發展到現在依然都是重要的，貧困啊、農村啊，都是婦女議題。我就記得零幾年的時候，衛生部的官員做健康議題，跟官員討論的時候，他就說：「在中國，只有一類跟性別、跟婦女有關的議題是值得關注的，那就是農村的貧困婦女，別的都不重要，尤其是什麼同性戀！在我的單位，絕對不允許他們去研究這個問題！」呵呵。所以說農村跟婦女從九幾年開始就是一個重點。

這個時期要提一下婦聯。婦聯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但是我們經常叫它「GONGO」，就是國家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是國家的機構啦！而且這個機構是從最上面一直到村裡面，村裡面的駐村幹部有兩個人是很重要的，一個是計生幹部，一個是婦女幹部，這兩個體系一直能延伸到最下面。也有人經常批評婦聯是好婦女聯合體或者良婦聯合體。在 1990 年代初，她們的政策參與中比較重要的就是 1992 年初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這個法被認為是保障婦女權益的主要政策。1990 年推動成立了「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等等，然後每 5 年做一個婦女發展綱要。為什麼要說這些呢？我是想說，其實你要更系統地看，在大陸出的跟婦女有關的政策真的不少，村裡面兩個重要幹部一個就是婦女幹部。要是從這些角度去看，你會覺得大陸的性別平等做得蠻好呀！政策出的也很多呀！各類保障都很多呀！包括在健康體系裏面，那些做健康議題的人就納悶：「欸，你們為什麼要關注健康領域的性別問題？我們有婦幼保健系統啊！我們的婦幼保健系統多健全哪！你看哪個國家有做得那麼好的？」他們覺得我們這套制度保障已經非常好了，非常多了，哪裡還有什麼性別問題？我們哪裡還有什麼不平等的問題？所以說，在制度建設上你會看到各類保障，各類法案，出的真的是很多，後面我會反思，我們現在訴諸於法律條文的改變，它到底有多大成效？或者說，怎麼去看待這個建制的成效？

1990 年代初建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輿論領地是《中國婦女報》。很多人在這上面寫文章，發表跟婦女有關的問題，現在還非常活躍的幾個行動家早年就是婦女報的記者。當時《中國婦女報》的記者後來比較多參與到性別運動，所以《中國婦女報》是個蠻重要的報紙。我沒有特別細地去分析它從 1990 年代到現在有一個怎樣的變化，但是你會看到很多人的履歷，欸，原來她們都曾是《中國婦女報》的記者，這就是挺重要的一個輿論陣地吧。

然後隨著市場化轉型，轉成一場直接焦點為婦女雙重角色衝突的論爭。就是看婦女面對家庭跟事業，該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有什麼衝突。八四年的時候有個大討論就是有關家庭與事業的矛盾的。然後後面表現為婦女的出路問題，就是婦女的出路在哪裡。其實這裡還沒到剛剛講的那個回家的爭論，但是會討論說婦女有哪些出路，婦女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再到後面一點就是職業婦女的角色問題。要走向何方，是事業，還是家庭，還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這之間是不是有衝突，如果有，那更好的出路在哪裡。包括當時都會有討論說「娜拉出走之後」，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就討論說出走之後怎麼樣呢？就這樣的一些文章一些討論也開始起來了。這些都發生在市場化的背景之下。

這段時期，跟 gender 更加直接相關的爭論點在什麼地方？我覺得可以從兩個點看。一個是 gender 這個英文概念的引進和翻譯的問題，以及當時很重要的一場關於西方化與本土化的爭論。比較主要的就是李小江與王政這兩位老師發起的。大概是 1993 年，當時有一個海外婦女研究學會，也就是說有一批在海外作婦女研究的，基本上是中國人、華人，當時回到中國大陸去介紹性別的議題以及做好多培訓，包括現在也還在做，主要工作就是翻譯 gender 以及介紹相關的理論。當時圍繞著 gender 的翻譯出現了一些爭論，比如說譯成「性別」，還是「社會性別」，「性別」是一個我們在中文中

常用的詞，像李小江就認為「性別」就可以表現出跟 sex，跟「性」不一樣的東西了，所以翻譯成「性別」就可以。像王政老師，還有其他一些老師認為不行，說「性別」跟以前的那種概念區別不開，所以我們要引進一些新的理念、概念，她們翻譯、推廣開來的概念就叫「社會性別」。當然後面還出現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她們自己也說看到一些人把社會性別重新翻譯成英文的時候用的是 social gender（笑），很多人哦！我都看到過，翻回去成 social gender，因為想要強調 social，區別「自然性別」，所以把自然性別跟社會性別一定程度上分得蠻開的。

甯應斌：我知道我們台灣有一陣子有些人也是呼應這個，書裡面叫作「社會性別」，後來就比較少見了。有沒有人知道這個狀況？

黃盈盈：那你們現在叫什麼性別？（何春蕤：現在就叫性別）

甯應斌：現在就叫性別，但是我知道有書叫社會性別，而且是一批，有幾個人，我忘了，好像畢恆達也在裡面。有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考察一下？

學生：他們通常是用對立於身體性別的那個 sex 的時候才會強調說，除了這個 sex 生理性別還有一個東西是社會性別。說社會性別是社會建構的，才會把社會性別騰出來，不然不會加「社會」這兩個字，在台灣也不用這兩個字。

甯應斌：所以台灣的性別教育教科書都是用性別。

黃盈盈：我們那兒是老百姓不知道社會性別，就叫性別。但是如果是學界或是在婦女跟性別研究界的，就會很有意識地叫社會性別，強調跟 sex 是不一樣的。我也在想，當時這樣的區分，尤其是對立於自然性別，強調性別的社會建構，對於後來表現出來的對生物性的忽視，對於身體、物質性的忽視，這之間有怎樣的關連，這是可以再討論的。1992 年有海外婦女研究學會在哈佛開了一個會議，李小江老師在她的書裡多次提到過，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在書裡面，我忘了是《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分認同》那本還是《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那本，李小江老師有提到過，在哈佛的那個會議上，她拍案而起，拿了個茶杯就離開了（笑）。你可以想像當時的緊張氣氛，她認為你們講的那都是西方的，都在講西方，尤其是美國那樣的女性主義，而李小江非常強調本土化的東西，所以她當時就憤然離席。其他的我都忘記了，就記得這個情節。

好，後面就是圍繞著本土化還是西方的婦女理論，也就是本土與西化的爭論，以及中國的性別問題到底是什麼。當時，學者們開始討論用「女性主義」還是用「女權主義」，我記得開始李小江反對用女權主義，其中的一個點是說女權主義是在西方的脈絡裡發展起來的東西，在我們這邊沒有這個脈絡，所以不能叫女權主義。李小江的理由還不是我們現在有人在說的覺得「女權」這個詞權力味道太強而用「女性主義」是因為它比較溫和，不完全是那樣，而是一個本土跟西化的爭論背景。雖然後來李小江並不關注在女權還是女性，但是本土化一直是她強調的點。「本土化是一個政治概念，她針對的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模式，在婦女研究裡針對的就是女權主義。以

女性的聲音發言是我的職責，以中國人的聲音發言是我的義務。」這是後來有的人在訪問她的時候，李小江自己回顧她的研究經歷以及她的觀點，她說她為什麼要強調本土化，是有這麼一個意思在裡面的。

李小江的書我是零幾年讀的，但是事情是發生在 1990 年代。李小江的《女性？主義？》題目裡是打的問號表示有爭論。190 年代開始，有人在談從婦女研究過渡到性別研究，因為婦女只關注女性，性別則關注性別平等，所以隨著 gender 這個概念翻譯引進過來，很多人說，我們要叫性別研究，不要叫婦女研究。現在重新去看改革開放 30 年以及世婦會的一些回顧文章，很多人是這麼寫的：婦女／性別研究，也就是開始把兩個都放在裡面，說不要吵了，就這麼叫了，

當時還有一個主要爭論點：市場轉型到底是帶來了更多平等，還是加劇了不平等？尤其 1950 年代大家看起來都一樣，對不對？現在改革開放後，差異性出來，隨之不平等的現象也表現出來了。所以當時的一個爭論是說，到底市場轉型帶來了更多的平等，還是不平等？當時階級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已經有一些討論，現在有些人說：「啊那個時候都沒有注意到階層問題」，那是不對的，那時候已經有注意到，是有討論的。而且當時有一些書名就把階層放在裡面，包括我剛才說的打工妹的議題之類，其實不是說現在的人才關注，那時候就有關注。

在社會學領域做性別研究的王金玲老師當時積極推動婦女研究的學科化建設，此外跟我比較有交集的就是在性工作這個議題上，但是屬於觀點有分歧的。她在一個回顧文章中說到：「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對於婦女發展帶來積極影響的，增強了妻子對家庭事務的發言權，使夫妻關係趨向平等。部分優勢女性有了更多擇業機會，更靈活的就業方式。這是支持改革開放，認為它帶來了好處的。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社會發展並不等於婦女發展。他們指出在看到改革開放給婦女帶來很多好處的同時，也要注意首先由於在非農化轉移中的滯後性」，非農化就是說從農業走到工業，簡單說從農村到城市，「農村女性在職業結構中處於不利地位。在農業領域出現了女性化的趨向」，所以她認為改革開放「並沒有給婦女帶來好處」，簡單說就是這樣。所以圍繞著發展和性別議題，是有不同的觀點的。

以上是非常粗略的 1980、90 年代初期的狀況。1995 年被認為是標竿性的一年，熟悉性別的就會清楚是 1995 世婦會，現在正在被熱烈回顧世婦會 20 年。那時候提出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這個行動綱領也影響了後面至少 1、20 年大陸的性別研究、性別運動，一直到現在，我覺得影響都還蠻大的。這個行動綱領「呼籲各國政府、國際社會和民間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私有部門，在下列重大的關切領域採取戰略行動：婦女與貧困、婦女與教育培訓、婦女與保健、針對婦女的暴力、婦女與武裝衝突、婦女與經濟、女婦女與決策權力、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婦女與人權、婦女與媒介、婦女與環境、女童」。就這幾個被列在上面比較重要的議題其實基本上已經包括所有了。現在很多人都在看：好，當時有這樣的一個行動綱領，那我就要看看你這個國家做得怎麼樣了，就是要評估：20 年了，你這個行動綱領貫徹得怎麼樣了呢？

男女平等是大陸的基本國策，當有人質疑中國大陸不重視性別問題的時候，很多官員

的回應是：「男女平等都是我們基本國策了，我們難道還不重視嗎？」但是實際上，大批的人對於這個國策是不知道的，中國人只知道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因為那個涉及到直接的生活，對吧，很多人挺著大肚子到處跑，所以她知道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抓得很緊。現在放開了，兩胎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男女平等是個國策。1995年首次提出了「男女平等為基本國策」的說法，表示對國際社會有個承諾，當然它也包括幾層涵義，第一是女性應該享有基本的權利，然後女性和男性要在政治、經濟等等各個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第三個層次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追求兩性之間發展結果的平等。它是有這樣的一些說法，所以其實字面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當時我看世婦會這一系列文章的時候，很多人就傾向於唱讚歌，就是覺得：啊你看你看我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我們制定了這樣的法律體系，我們取得了這樣的成就。如果有反思，一般也都是象徵性的，在文章的結尾處提一下，說我們在這一方面還不是特別夠，有待進一步的發展，都不是非常嚴肅地批判性思考。我的那篇反思 gender 在中國的文章，當時 reviewer 的意見也是說：「你要看到大陸發展取得的成果」，意思是說你不要這樣子批判，我們好不容易取得了這些成果，而且你看社會對我們都不理解，然後你還自己在那裡批判！所以你看大部分的文章，就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批判與反思。我不知道年輕的女權會不會把這個習慣延續下去，還是它可以有更多自我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其實如果你看某些文章，就會覺得大陸的性別平等簡直做得太好了，各類法律要什麼有什麼，什麼樣的體系都全了，包括了土地繼承法之類的都已經涉及性別議題了。世婦會之後有聲音說「社會性別主流化」，這個議題在世婦會之後被提得非常多，性別在不同領域的主流化，包括學界，也包括當時非常多針對社會性別的培訓項目。當時在社會上也引起蠻大爭議，有更多不同社會人士介入的一場討論是 2000 年婚姻法第二次修訂。第一次婚姻法的修訂是 1980 年左右，第二次的修訂是 2000 年左右。當時召開了不只一次研討會，邀請了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專家跟司法工作者來討論，當然也有婦女工作者參與。你看這說法：「從社會性別的視角明確提出，堅持一夫一妻制，反對重婚納妾。夫妻應該相互忠貞，反對與制止家庭暴力，並對法律條文的表述提出具體的建議。」回到「社會性別主流化」，「女性傳媒」是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這個領域比較有名的是卜衛老師，她是做傳媒這塊，非常活躍，她參加、策劃，而且確實做了很多的性別培訓，提高社會性別意識的培訓，就是要在培訓中提高你對社會性別的敏感性，經常會放一些廣告讓大家看看性別盲點在什麼地方，如何提高社會性別的敏感性。早期的培訓有一個指導方針，就是 1998 年在聯合國的支持之下，製作了一個社會性別培訓手冊，之後很多培訓都是在這個手冊的指導下開展的。當時有很多這類的培訓，現在依然還有，多了一些變化而已。

還有就是性別與貧困等農村婦女發展的項目，當時也有一些支持農村婦女的資金，讓婦女去做一些小的、可以帶來經濟收益的活動，這一類的項目也開始做起來了。當時有一些從國外引進來的手法，比如給個相機，讓她們自己去拍攝自己的生活啊等等，就是說要讓婦女自己說話，她們不知道該怎麼說話，那我們就給她一個相機，讓她們自己拍自己的生活。這套話語應該不陌生對吧，這樣的事情在世婦會之後在大陸有所

開展。

還有就是性別與生殖健康，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健康類的項目，包括中國有一套婦幼保健的體系，這也使得很多做健康的人特別不能理解，你怎麼能說我們的健康體系沒有性別視角呢？你看看我們的婦幼保健體系做得多健全！有一個婦幼保健室以及一套體制內的東西。還有就是學科建設，就像剛才提到的王金玲老師，她在浙江社科院做了很多推動學科建設的事情，包括推動建立了很多性別研究中心。當時我還特地去找，到底有多少家婦女研究中心或者性別研究中心，二零零幾的時候查好多文章，後來在比較大的婦女研究網站上查到一個大概情況，當時它幾乎鏈接了所有的婦女研究中心網站，所以我就一個一個地給它點開來看北京地區它列了哪幾家，上海地區它列了哪幾家，整個數過來總共有 111 家，大概一百多家吧，不精確，不過我覺得不會差得太遠。世婦會 20 年有一個回顧文章提供了這樣一個數字：全國 12 個省市區建立了 21 個性別研究與培訓基地，這是培訓基地，然後定期召開年會和學術會議，開展性別這一類的議題。研究中心就是至少 111 家掛名而且開展工作的，我後來看了一下，我們所知道的這幾家也確實在上面。還有 2006 年教育部把「女性學」列為新設的本科專業，這在學科建設上是一個大事情，如果你能把一個學科列入到本科專業的目錄裡面，那是挺重要的。我就告訴你，現在人類學在我們人民大學裡面還沒有本科專業，但是 2007 年中國社會學學會女性／性別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簡單說，就是 2006、07 年的時候有一批人致力於性別相關的學科建設。

何春蕤：我想問社會性別主流化的問題。台灣也有性別主流化，非常清楚地貼近聯合國的整個架構、內容和操作，因為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有好處。但大陸在推的性別主流化有些東西比較清楚是聯合國的項目，像生殖健康啦、貧困發展之類的，可是像婚姻法這樣的發展，你知道它就不是本地搭聯合國的車。國家對於什麼樣的性別議題有關切呢？換句話說，大陸的性別主流化基本上是在聯合國的架構之下來做呢？還是就混雜著一起，反正當下在搞一些問題，就通通放進去一起發展？比方說教育部在學科上做那些結構性的改變，它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動力呢？這件事來自於國家？來自於聯合國？來自於本地？有什麼樣的動力？大陸的性別主流化有多少是聯合國的成分？有多少是國家的考量？有多少是研究的人和性別的人搭順風車？

黃盈盈：嗯，好，我需要再去好好梳理。大概的感覺是婚姻法的修訂跟聯合國不是特別大的關係，因為每次婚姻法修訂的時候，政策制定者會把相關的人找出來，他們認為婚姻法跟婦女的關係很重要，像 1980 年代修婚姻法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大的改變是離婚自由，包括確定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這一類的議題是跟女性的利益非常相關的。2000 年的修訂也是這樣。我的感覺是，當時主要是法學界發起的一個討論，不完全是婦女運動主動發起的一個討論，我會覺得這個議題跟聯合國不是太相關……至少它的推動力不完全在聯合國這邊或者國際這邊，比較像是延續原來婚姻法發展的一些脈絡，以及比較偏國內參與的一些人。

性別培訓和發展項目這一塊主要是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去做的，包括學科的建設。其中還有一大塊是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它支持了很多當時婦女的項目，包括現在對性別的

推動，福特基金會的地位還蠻顯著的。所以從 1990 年代開始，國際力量很重要，但是要分不同的國際力量。UN 是一塊，福特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們性研究這一塊主要是福特支持的。像健康類的那一塊還不完全是這兩個機構支持，就比如說從 2000 年開始，我接觸過中澳大利亞愛滋病項目、中英愛滋病項目等，這些項目帶進來的時候會同時要求貫徹他們本國的健康與性別發展，所以中國要跟他們合作，也要掛上性別議題。所以，出資方的發展署對於性別與發展的要求密切相關，我比較熟的是中澳的項目，中澳項目當時進來的時候資助方是 Aus aid 嘛，就是澳發署，它有性別的硬性要求在裡面，所以大陸要跟澳洲政府合作，就要貫徹社會性別的視角，你的項目裡面要請社會性別的專家，我就做了幾年中澳愛滋病專案的社會性別專家。

至於學科建設，教育部當時怎麼把女性學列入的具體細節，我還沒有特別研究，可能跟一些人的位置和背景有關，王金玲老師自己的背景是可以在體制內說話的。有一批女權主義者那個時候是在體制內有位置的，不一定是虛設的位置，還不一定是在婦女系統裡的位置，也跟家庭背景有些關係，她們有能力去調動一些資源發展這一塊。當然跟國際趨勢也是有契合的，當時藉著世婦會的風，實際上在政策上是有利的。國家已經做了承諾，然後要實現這個承諾，需要一些建制工作。所以在國家層面上，至少它沒有很大的阻力不讓你去這個事情，我的感覺是，去做就去做吧，反正影響也不是特別大。此外，也和歐美學術界、性別研究的發展局勢有關。

像 NGO 的發展以及參與式的方法，這跟聯合國的推動緊密相關，到現在都還很流行。其實我覺得要比較好地回答何老師的問題，真的得拿一些個案好好地去看一看它是怎麼發展的。比如說像紅楓熱線這個 NGO 的發展，這個婦女熱線是王行娟老師發起的，1988 年就有了，我覺得它跟國家的體系是有關連的，雖然說 1950 年代大家都在爭議那時候的婦女平等算不上真的平等，但是至少在體制建設上這套東西是有的，包括婦聯系統的建設，這一塊是有的，所以是有在做一些事情的。紅楓婦女熱線 1988 年成立，但是榮維毅老師的訪談有說到（她在 1990 年代是紅楓熱線的志願者），在九幾年之前，即便它是婦女熱線，但實際上是沒有多少性別視角的，然後會請一些人對婦女熱線的工作者進行社會性別的培訓。所以說像婦女熱線等一些機構，在世婦會之前是有的，但是後面的人會說你們沒有太多性別的視角在裡面，而世婦會之後推動了整個社會性別的主流化進程。如何納入性別視角，如何提高性別的敏感性這一塊，我覺得跟國際的推動是很相關的。具體還要再去好好看一下。

那還有一塊是反家暴工作。包括榮維毅、馮媛老師，她們參與很多反家暴的網絡。剛開始的反家暴網絡你很難講它是一個民間組織，它有蠻強的政府背景，是婦聯的背景。我記得馮媛老師就特別明確地說，而且一直強調，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叫反家暴網絡，就是有一點像跟以前的那個東西區分開來，她現在在提的議題是民間的反家暴，這個「民間的」提法是有意思的，因為很多人現在講自己的 NGO、自己的行動是「民間的」。她們想跟原來國家支持的或是說大家都知道婦聯是 GONGONG，是國家的 NGO，有點想跟它撇開，也不是完全撇開，但是會強調說我們跟原來的不一樣，我們是民間的力量，我們是民間的聲音。包括現在的反家暴法，馮媛等人就很強調這是民間推動的第一部法律。所以用民間這個說辭有著另外一種正當性在裡面，包括現在討

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民間跟體制的關係，這裡邊有張力在。

那時有些書出版，比較有名的像李小江主編的《平等與發展》，金一虹、劉伯紅老師主編的《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王政、杜芳琴的《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翻譯了國外的一些作品過來。李慧英老師出版了《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她 2014 年又出了《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這裡列的一些人都是那個時候非常有名的比較老一代的女性主義研究者或者性別研究者。

基本上所有的教科書會納入 Gayle Rubin 的〈女人交易〉這篇文章，但是只有一兩本會把 Rubin 的第二篇文章就是她後面反思性跟性別屬於分開體系的那篇文章〈反思性〉放進來。很多人認為她的第一篇文章對性別研究很重要，認為第二篇文章屬於性研究，所以我還真的是在艾曉明老師的《女權主義讀本》裡面同時看到這兩篇文章，在李銀河老師那個女性主義讀本裡面也有那兩篇文章。大部分的教科書只有她的第一篇文章。這個一定程度也可以看出大多數女性主義者對性的態度。

當時還有兩個議題要講一下。一個與小姐有關，也跟我自己的研究比較相關，就是王金玲主持的賣淫女項目，這也是福特基金會支持的。我不說福特壞話，因為福特對我們支持力度特別大，沒有它，我除了研究之外，很多事情真的幹不了。王金玲老師在收容所裡做賣淫女研究，她堅持不能叫性工作者，剛開始叫賣淫婦女，後來叫商業性服務工作人員。她好幾輪的項目，1997 年開始一直到 2008 年，都是關注「社會—心理—醫學模式幫助賣淫婦女」，然後開設了多種技能培訓班等等，力圖改善讓賣淫婦女不至於走上賣淫之路的不良環境和條件。從九幾年開始，她們是這樣的一個調調，但是零幾年以後有一回開會聽到王老師說：「女人的上面能講（就是上課用嘴巴講東西賺錢）下面為什麼不可以賣？」當時我還蠻奇怪的，欸？轉變夠大的呀！怎麼忽然就走到女人下面賣也沒關係了？至少她說女人上面下面能賣的器官沒有什麼不同嘛！2008 年，她組織了一次跟性工作有關的政策與法律討論會，很多人又開始提罰嫖不罰娼，所以大陸的女性主義在這個議題上具體的細節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論述上也有一些轉變，但是整體依然認為這是制度對女性的壓迫，沒有女性會自願做小姐，這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即便不罰女的，她們也確實因為各種壓力走上了這條路，那我們也要罰男的，我們要通過罰男的，把這個制度給推倒。

當時還有另外一塊在大陸開展的重要活動，叫「關愛女孩行動」，是計生委系統開展的，但是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反思「關愛女孩行動」到底是對女孩子好還是不好。因為這個行動專門提出女孩子需要保護，尤其強調保護女孩子，因為初衷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注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問題」。很多人或許知道，出生性別比在大陸的情況比較嚴重，人口學如果跟你講性別問題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性別比失衡的問題，他們講 gender 的時候主要關注的就是性別比問題，看不到別的性別問題。這也是當時計生委他們做的一大塊自認為是體現社會性別視角的重要工作。這是在零幾年發生的。

前面介紹了當時影響力比較大、比較主流的一些情況，另外也有其他議題。李銀河老師稱呼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的很多東西跟性是有關連的。她在 1998 年出版了《中國女性的情感與性》，還翻譯或編寫了一系列書，像同性戀亞文化、虐戀亞文化、女性

主義論壇這些題目——最後這個好像正式出書了，叫《女性主義》，其中就有介紹美國 1980 年代的性戰。所以，有關女性主義性爭論，大陸不是沒有文本，但是後面有沒有人去看這些，還是選擇性地去看，那是個問題，但至少那本書是零幾年出來的，當時 Gayle Rubin 的論述，包括跟巴特勒的對話，還有很多圍繞著性問題的爭論，在那本書裡面都有梳理討論，而且像劉伯紅等老師都有參與那本書的編寫。當時據說在 Berkeley 開了一個會議，大陸好幾個女權主義者參加了，然後相關討論出了那本書，但是感覺不出來那個討論對大陸現在的性／別議題有多少幫助。

艾曉明老師的團隊做了蠻多事情，包括她們做《陰道獨白》，讀書，對同志運動的支持，等等。北京的同語做拉拉口述史的研究，最近世婦會 20 年，同語也訪談了很多當時的運動家，包括拉拉群體，也包括幾個對拉拉議題比較支持的女性主義者，講述她們是如何去看女性跟拉拉的議題。還有何小培自己創了一個「粉色空間」，小培比較強調性的這一塊，尤其是強調性快樂。當然還有方剛在做的「白絲帶」，比較有爭議，方剛的「白絲帶」也是聯合國支持的，性別平等鼓勵男性參與，他最近也要整一個「男德班」，不曉得有多少人在媒體上看到過。針對一些商業團體搞的「女德班」，他就搞「男德班」培養男性性別意識，不知道有幾個人參加，但至少是在聯合國的帶動下，男性開始參與了性別平等這個議題。

我寫的那篇文章基本上回顧的是大陸 1980 年代以來的脈絡。文章寫在 2012 年左右，那年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後來被人稱之為「青年女權行動元年」，因為當時有一些活動引起社會關注，包括佔領男廁所、受傷的新娘、上海地鐵的我能騷你不能擾、光頭姐抗議教育部等等，後來這些都被稱為街頭行動藝術的活動。稍晚還有《陰道之道》的排演以及在高校的一些演出，不過我的文章針對的不是這些新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才剛剛起來，我的文章針對的是學院派的知識生產、研究的層面，針對主流的女性主義，看看 gender 在大陸的發展有什麼樣的脈絡與問題。那時候我是拿性／別這個視角去看，很強調 sexuality 在性別研究中的位置，有一些概念翻譯過來很難用，很難符合大陸說話的習慣，所以我也借這個概念來表達 sexuality 的重要性，強調多元的性別、差異性、流動性與其他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性。我覺得這幾個內涵是非常重要的。

我拿這樣的視角去梳理主流女性主義研究的時候就會覺得，gender 這個話語體系在大陸有很大侷限性。一個是很多人字面上說我在打破二元的對立視角，打破性別的本質理解，但是做法以及實際的效果在我看來很多時候反而加強了性別的對立，更僵硬的把你歸在男的，把你歸在女的。另外就是在議題上你要說完全無性也不對，拿何老師的這個說法可能更精確，比較忌性或者比較否定性的態度，更傾向於去談騷擾、暴力這類議題，而對於正面的、積極的性的想像是缺乏的。在分析策略上，確實有著蠻強的唯性別主義的特點，這也是何老師當時在演講中有提到的。唯性別主義就是 gender-only 到了一個不需要去分析就已經有結論的地步。也就是說，不需要去看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就直接說這是男權社會，這是性別不平等，而忽略了其中的複雜狀態。運動這塊應該也有這個問題，我當時看了學界的文獻，就覺得學問要這樣子去做，那還需要你去分析什麼呀？因為你結論就已經很清楚在那兒了，而且你完全看不到跟階層的

關係，跟其他議題的複雜性，這些都被簡化了。因為有這樣的印象，所以我寫了那篇文章，這是當時的整個背景，文章我就不細說了，有發給過大家。

比較有意思的是後來的一些發展。一個是 **reviewer** 的意見，我剛才說了：要多說一些好處，不要批判！另外一個是，雖然很少人看學術文章但還是可能有些人會知道，例如潘老師在線上寫了一篇被罵得很慘的文章，他當時有一句話：「根據學者黃盈盈的介紹」，然後我就直接中槍了。當然很多人沒有去看提到的文章，都只喜歡看新聞，查學術好像大家都覺得太麻煩了。正因為潘老師那篇小文章引起了很多罵聲，罵得很慘，所以我就很認真地看了一下到底吵架吵在什麼地方，在罵什麼，然後這邊的回應是什麼。我還聽說王政老師每年在上海復旦跟南京這邊有社會性別的培訓班，包括海外的會議，這些培訓班除了讀很多現在活躍的青年女權主義，那年被罵了之後我聽朋友說，她們現在讀我這篇文章，搞得我還蠻緊張的，我在想，是不是第二天就要罵我啦？當時的激烈程度是很高的。

現在要說後面青年女權的這一塊。我們先看看它發展到什麼樣的情況。我覺得青年女權跟主流國家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怎樣，這需要再去好好討論一下，不完全是割裂的，因為有一些人是在兩邊都跨著的。兩邊的策略又是非常不一樣，主流女性主義，尤其是佔有國家資源的那些主流女性主義，她們對青年女權的看法及做法不一定是支持的，所以如果談「女權主義在大陸」，那就得看看是在說哪一些人，它不是同一個概念。為什麼要說這個呢？因為有的人一說到女權主義，就馬上把把它想像成大陸所有的女權主義都是這樣，另外，當別人都在罵大陸的女權主義的時候，很多人也會覺得你在罵我，但是有的時候你不是在罵她，但是她會覺得你在罵她。現在流行動不動就吵架。

還有一個議題值得討論，就是女權跟 **LGBTQ** 的關係，尤其是女權跟拉拉的關係。有一年在我們的會議上，韋婷婷有過一個發言，就是講拉拉跟女權的關係。我跟大家簡單說一下，在那篇文章裡有介紹 2012 年女權行動是怎麼出現的，跟一個反歧視的組織有關。剛開始是以反歧視為主，後面集中在性別平等這個領域，2011 年開始策劃一系列行動藝術，招募志願者，然後去做街頭行動。當時參加進來的大部分人或至少有相當大部分的人是拉拉人群。那篇文章提到，在討論李陽的家暴議題的時候，有人有提：我們也要把拉拉的議題放進來。但是有人回應說太複雜啦，我們不要把太多議題都放在這，我們現在重點是反家暴。好多新聞採訪以及後面出來的聲音就不是以拉拉的身分出現，而是以女性的身分出現。當時有些參與者解釋為什麼不要以拉拉的身分出現，為什麼不要把這些議題同時帶進來，因為拉拉被要求自己去想自己的議題，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沒有提到性少數。後來也有人說是以女性的身分參加活動，和性少數麼的無關，或者說如果提到同性戀就會模糊事件的焦點，大家就不知道怎麼處理，本來讓社會接受男女平等就已經不容易了，如果這個時候再拋出同性戀的話題，就會被認為是你們同性戀在亂搞，覺得不太好。這倒不是說女權行動壓抑了拉拉的運動等等，而是說女權跟拉拉的議題當時是有一些討論的，後來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然後是涉及到女權與性權的建構，我其實也是在 2013 年才知道有這麼樣被建構起來的女權與性權，那到底是不是已經被建構成了兩個概念，還是說只是少數人在媒體上說一說，其實都是有待討論的。有時候如果一味強調女權跟性權的差異在哪裡，一定程度上又再強化了這兩個的二元對立，但至少在內部，關於女權主義在性方面的一些論述，性別與性的關係，是需要再去看一看，需要去分析的。2013 年，當時陳亞亞在我們性研究會議上發言，說了女權派與性權派的對立，當時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我不太上網，可能網路上已經有吵架，但是我是不太清楚，所以我當時聽到的第一個反應是：那我是誰？我記得何老師就在我旁邊，何老師說你是性權（笑）。當時我是第一次聽到。

後面就涉及我最後想談的一點，就是女權主義在性議題上的主要糾結跟爭議。其實跟我 2013 年聽到的狀態相比，現在已經有一點變化或者不一樣了。比如說圍繞著性工作的這個議題，現在的青年女權是有一些討論的，跟原來大部分主流女性主義者很敵視性工作者不一樣的是，青年女權與性工作者有一些方面是有合作的，比如說在廢除收容教育這個議題上，一些性工作的草根組織也有加入進來，一起去討論議題，但是整個的導向又是偏罰嫖不罰娼。細的部分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圍繞著性工作，尤其 2014 年的東莞掃黃事件有各派的爭論，有一種是體制與自由派的爭論，或者說左右的爭論，基本就是把性當成一個政治議題來看。還有就是女權對男權的批判，這個比較不這麼新鮮了。還有一個聲音是，這是無產階級底層婦女對資產階級男權消費經濟的批判，認為不要忽略性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只談性的政治學，還要談性的經濟學。那個「性的經濟學」就是資產階級消費經濟，也就是說你們這些認為應該非罪化的人沒有看到資產階級的消費經濟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圍繞著東莞這個事件有各種聲音藉機在抒發一些東西。

還有就是在反性侵幼女和反性騷擾議題上，當時廈門的博導性侵、性騷擾女學生案件，是推動「師德」以及在校園裡反性騷擾的，後來積極地推動反家暴法，包括現在要把家暴擴大到親密關係的暴力。就是在這些領域，女權與性權有過交鋒，或者說在這些議題上構建出「女權與性權」的分野。

新女權，我覺得對於女性的身體自主性是蠻強調的。包括《陰道獨白》，包括「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它對於女性的身體與性解放是有一些論述的，不是沒有論述。但是在很多的場合，在很多的討論裡，又感覺對於女性身體的物化非常地深惡痛絕。所以即便是討論到一些色情的議題，只要不是「物化」女性，那是可以的。但是什麼叫「物化」女性，在涉及到「物化」身體，涉及到「性化」這些概念的時候，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與分歧。圍繞著性侵事件，那邊搞了簽名連署，兩百多人，這邊也搞一個簽名連署，有點針鋒相對。性權和女權，沒有那麼絕對的對立起來，可是在有一些議題上的分歧與糾結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沒提性教育，因為性教育現在也是蠻亂的。在大陸，包括宋少鵬寫過一篇文章，她剛開始說性權與女權是不同的派別，不同的流派，後來在文章裡特別提到有個女性主義者提醒她，說那個不是性權，是性學。方剛這邊主要力量是性教育的，包括有一些

性教育的家長，所以宋少鵬又把它改成了性學，改成了女權跟性學的爭議，連性權都沒有提了，就因為這裡頭很多人被認為是 sexology，包括彭曉輝，做「性科學教育」的，所以把這個力量視為 sexology 的，不被認為是性權。

我其實特別想在台灣這邊跟大家交流這一塊。因為我覺得台灣有一些爭議真的是都已經經歷過，其實你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但是在大陸，很多東西很難說已經塵埃落定，但是又出現了一些苗頭，這些苗頭在多大程度上或者說它的導向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我們擔憂的那種？……怎麼說呢？如果大家看到有一些事情的導向是不好的，那能不能提前多一些聲音出來，可以有一些改變？確實有國內的力量也有國際的力量在推動女權議題的發展，最近發生了兩件事情值得提一下。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推舉百位全球的思想家，其中一個就是 5 個被捕的女權行動者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國際力量的支持。還有一個是清華的女學生，她得到獎學金，現在在大陸網絡炒得蠻厲害的，就是每年五萬英鎊的獎學金，在牛津大學留學。看那個學生的履歷，當然她可能很優秀，我不太認識她，她參加了很多活動，第一跟青年網絡有關，第二跟 LGBTQ 有關，第三，婦女的議題。還有，她是英文系畢業的，英文很好。你看她的背景，你會看出國際上傾向於支持哪一種人，但同時你也會看到國內排斥哪一些人。噢，那個女孩子還有一個背景很重要，就是 labor，勞工，她介入了很多勞工的議題，所以你就知道國際支持哪一些背景的人，它對中國的想像是什麼樣的。而大陸政府，它對於青年女權的態度其實真的不好，它會覺得你們在鬧事，它會覺得跟公民運動放在一起是鬧事，所以它會說：我們要做性別平等，但是不要採取西方的那種方式去做，也就是不要搞大的街頭運動，不要搞反對這個體制的做法。其實是蠻複雜的處境，所以我們也會說這個導向跟變化會受到國家跟國際力量的型塑。尤其是在 5 個小女權被抓的時候，國際的力量、聲援以及現在的支持，我覺得也會影響女權的發展。這些議題我還蠻希望在台灣討論討論，就是說看看有沒有一種對話的可能，或者說聽一聽不同的經驗。好，我就講到這，看看其他人有沒有什麼問題與補充。（以上，張峻昱騰稿）

討論

甯應斌：大家有什麼想法或者是評論可以隨便發言沒有關係。

同學 A：我想要問老師兩個問題，一個是老師 ppt 裡面有提到，2000 年婚姻法修法的時候有一群專家學者或是婦女工作者出來堅定地說要一夫一妻、反對重婚納妾，我會想要知道這個跟當時修法的脈絡是什麼關係。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因為修法裡面有這一塊爭議，所以才會促使他們出來發表這個聲明？

黃盈盈：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沒有太回過去看當時修婚姻法的文件（不好意思），當時修法的那些材料，我老早當學生的時候讀過至少兩三本論文集，編的就是當時的一些爭論點，我現在有點忘了。但是，修婚姻法跟同志婚姻沒有一點關係，那個修婚姻法是當時社會上有很多報導關於包二奶，2001 年左右搞破鞋、包二奶這類社會現象的報導非常多，所以當時有針對這些議題，說要防止納妾以及夫妻要相互忠貞、忠實，要把這個議題寫進法律裡面去，修法是跟當時這樣的社會背景有關。

同學 A：但是包二奶在法律上面是合法的嗎？還是說當時社會...

黃盈盈：沒，沒合法，它也不合法。但是在社會現實層面上就有很多報導，讓你感覺到處是二奶、全都是二奶，所以他們覺得在立法上要寫清楚，婚姻法裡面要有保障，要把忠貞這個事情寫到法律裡面去。當時的爭論點，我忘記法學界具體的背景是怎樣...，我需要再去查一下再回答你。這個問題是蠻重要的，除了我提到的現實背景，當時為什麼要吵架，當時有什麼樣的爭論，我回去再看一下再回應你。

甯應斌：對啊，為什麼要表徵性的表態？研究當時的輿論就可以寫這個題目。因為主要是很多港人去包二奶，所以這個事情在香港也引起爭議，香港的吳敏倫就是站在支持包二奶的立場上。再隔若干年之後，就開始出現小三的問題，好像人們認為做小三的比較囂張，當時小三網可能還沒出來。

黃盈盈：小三網是後來出來的。另外一邊又出來一個叫拆散小三的網，就是勸你別做小三，最近還蠻火的，就是教你怎麼去把小三幹掉。

甯應斌：現在是不是基本上沒有法律懲罰小三？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很多都是對小三的公開暴力。

同學 A：通姦罪呢？

黃盈盈：大陸沒有通姦罪。好像之前在你們這邊看到抓猴網，我們沒有。

何春蕸：那就是徵信社，專門幫人蒐集通姦資料。

甯應斌：這存在很久了，至少二、三十年。

黃盈盈：但是通姦有時候會放在大陸的重婚罪裡面懲罰，而重婚是入罪的。如果有證據你生了小孩，是會起訴的。但是一般情況下，包二奶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

何春蕸：我想講講從二奶到小三的轉化。我的感覺是第三者或者更複雜的親密關係長久以來就有，但是二奶會成為熱烈議題，其實反映了當時非常重要的經濟變動，特別是香港商人或台商剛進入大陸，在大陸包二奶，這裡面牽涉到國族、地域、經濟的變化發展。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動其實是用二奶的現象浮現出來，而且二奶議題不是在吵忠貞，而是怕家產或小孩失去了爸爸原來的財富支持。但是到小三議題的時候已經越來越集中在個人的感情上，這個變過程我是沒研究，只是直覺這裡面有些差異，就是前者比較多的反映當時經濟變動以及港資、台資投進去所形成性關係的變化；而到小三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小三、小王、劈腿、小蜜之類的，就是更複雜的多種人際親密關係，而不單單只是經濟為本的女性個人依賴某一男人，這是一個有趣的變化，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感覺是不是對的。

黃盈盈：恩，應該可以去分析一下。再加上現在反對二奶還跟反腐連結在一起了。反腐

案件爆出來的時候不單是說經濟問題，還一定要找出性方面的問題，包括新聞經常報導不知道第幾個奶告發這個官，這類的新聞報導挺多。這種貪官被報導出來之後，其實我們都知道應該是政治議題、政治問題，但是通常一定要扯上關係的腐敗，另外一個就是性生活混亂，包養很多人。不過主事者也不完全說這個人在性方面亂，而是會說他有好幾個家庭，跟不同的人生了好幾個孩子。最近幾年的二奶恐慌因此又跟反腐非常密切地連在一起，好多報導把性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扯在一起。

何春蕤：這部分是不是因為在反腐過程中，利益糾葛其實很深、盤根錯節，可是在性方面的私德卻是一個很容易扣罪名、毫無疑問可以被譴責的東西？

黃盈盈：沒錯。

何春蕤：所以只要把性議題加到反腐上，這個人就是絕對的腐敗，比較有煽動性。

黃盈盈：對。腐敗其實現在也蠻煽的，老百姓特別痛恨腐敗。包括我媽媽那一輩的老百姓覺得國家反腐是好事啊！老百姓情感上挺激動的，然後現在在道德上再給加一碼，踏上另外一隻腳，你就翻不過來了。政治上要把你打倒，就把腐敗經濟利益跟性的東西扯在一起，非常明顯。

庸應斌：你提到現在大陸的女權組織有拉拉在裡面。台灣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但是王蘋講過一個差異性，就是台灣是拉拉先進入女性主義團體，先學習了女性主義，先受到女性主義的洗禮，然後慢慢再蛻變，後來才有蓬勃的同性戀運動，甚至同性戀研究這類東西都是 1990 年代後的事情了。我想反過來問大陸的狀況，這些拉拉們是不是對所謂女性主義一開始不熟悉？後來才比較接受到周遭的觀念，像是同志這些東西，是不是這樣子？路徑有點反過來的，是不是？

黃盈盈：對，我覺得如果只論大陸的女權行動派，不僅要考慮到中國歷史上女權裡的脈絡，還要考慮到西方至今左、右派的壓力，不能忽視的就是各地不同的運動發展脈絡。像剛才說到 2012 年被稱為女權元年，那些行動裡面其實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性少數，而且不只拉拉，還有 LGBT 等，我覺得確實跟西方和臺灣不一樣。**大陸那邊真的是同志運動比青年女權運動早了可能至少 7、8 年。**然後，2012 年女權行動會膠著女權拉拉，或叫做酷兒女性、酷兒女權活動家，當然會帶著一種更強的性別平等意識，這可能也與同志運動本身狀態有關。有一種玩笑的說法，大陸的男同志要去抱愛滋的大腿，女同志因為資源少，要去抱女權的大腿。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同志運動中偏向男同志主導，一些人在參與中國拉拉或者女權運動的時候會刻意去強調同志運動中的性別因素，強調在同志運動中也要有性別視角。這些因素可能都會攪到一起，在這些活動中可能有一些情慾的自主和流動，也讓更多參與的所謂直女吸納或者說自身去實踐更多元的性別理論，甚至有說法說「直的進去，彎著出來」。我覺得這裡面也許有很多問題存在，像身分政治的問題，是不是只有純正的異性戀女性可以參與女權運動？或者說，女權運動首先要以婦女權益議題來開展，如果這時候你去倡導性權，社會的爭論會更大而帶來的成果會更小，甚至更可能遭到打壓，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裡面的性少數會被要求以女性而非拉拉或其他身分去出現或發聲，就是造成另一種的隱形化

吧！

甯應斌：性少數一開始出現比較是在所謂民間，不可能在官方、體制裡面，可是官方、體制裡面已經有女權的完整存在，所以民間女權應該是比較少吧？

黃盈盈：主流的女性主義有 4、5 個婦聯系統蠻重要的人物對於拉拉的活動還是支持的，但不是整個體制如此，只是有個別人會支持。當時北京同語的口述史裡也有談到，她們其實在早年 1990 年代也想尋求女性主義加入來支持一些活動，但是就只有數得出來的那幾個人支持。後面青年女權的那幾個活動，至少在看到的資料裡面，大部分是性少數參與的，甚至是主力，這種合作明顯的比之前要強。拉拉同志運動其實八幾年，更早就不說，至少八幾年的時候有過一些比較地下的活動，包括現在福特基金會的蘇茜她們八幾年、九幾年有在上海、北京一些大城市搞拉拉 PARTY，就是以家庭聚會的形式來做活動，以比較家庭化、私人化、地下化的方式來進行。可是沒有像這幾年社會顯著度那麼強，也沒有像現在拉拉跟女權之間關係的顯性化那麼強。

甯應斌：那麼拉拉的論述話語資源是什麼？是怎麼來的？臺灣一開始就是很多人引介女權主義、女性主義進來，那大陸拉拉的論述資源管道是什麼？讀什麼東西還是根本不讀什麼東西？我想知道她們是從哪裡得到話語資源的？

何春蕤：早年的時候會讀一些臺灣的文獻，也會讀一些國外的文獻。

黃盈盈：嗯，拉拉沙龍是蠻重要的活動，當時會讀一些書，做一些講座，後來王政在女權這塊推動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有些從臺灣來，但也有直接讀西方女權的東西。

何春蕤：西方的東西在北京拉拉圈裡很流行。

黃盈盈：對。

同學 B：黃老師您好，我想問個問題。在您看來，您的研究接觸過或是您實際投入到一些公正方面的活動，我比較好奇有沒有那種立意是好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最後收效可能是和這個發起人或者活動主辦方式有差距的事例？我想聽聽有沒有這樣的具體實例。這段時間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帖，說一個愛滋病的 NGO 是怎麼去擴大愛滋病的污名，我之前也讀過一本書《我的涼山兄弟》，是一個民族誌，做的是四川涼山裡有關愛滋病的防治網，書裡有很大的篇幅說「無論是當地的政府、地方的政府，還是說全球性的防治愛滋病的 NGO，他們進駐以後反而在當地的民眾中加深了關於愛滋的封號或者污名。因為本來對於愛滋病他們沒有這種社會隔離，但是這些團體的介入反而造成了社會隔離。」我想比較具體知道有沒有這方面事例？性別相關或者性相關的。

黃盈盈：好，蠻好的問題。根據我的觀察，或者參與的一些會議或者交流，來談一點例子。你正好提到愛滋病，最近發生了一件很典型的事，就是疾病管制署 CDC 最近在做的也是被炒作得比較多的事情正好跟你談的有關，就是在校園裡防治愛滋病。他們引用大量的數據報導說高校裡的感染率有多高多可怕，尤其是新發感染率有多高，現在

12 月份愛滋病日剛過，這類的報導非常地多。意思是我們要關注這個大學生人群，尤其是關注校園內的男男人群，但是本身說法上經常帶有歧視或者恐嚇式的問題在裡面。有人提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是典型的反應，「我是為你們好啊！我的立意是好的呀！我是讓大家減少愛滋病的感染，這是為你們好呀！為什麼你們還反對？」此外，當時有在討論是不是要伴侶通知，就是強制把感染情況告訴伴侶，「我是為你們好，是防止傳播疾病呀！」但是它不會考慮社會層面的後果，包括標籤帶來的歧視，CDC 不太關注這一類東西，這就很典型成為你說例子，「立意是好的」，但是造成的卻是更多的對這個人群的歧視。

我覺得愛滋病這個領域裡面就是挺典型的習慣貼高危人群的標籤。早年，九幾年的高危人群是女性性工作者，官方叫暗娼，這是一個高危人群。第二，吸毒人群，1990 年代初還有賣血人群，但現在不太提賣血人群了。至少吸毒人群、性工作者，還有嫖客，這幾類是被標為高危人群的。2005 年以後，尤其是最近幾年，男男同性行為者 MSM 是比較顯著的高危人群。跟這差不多時間的農民工 migrant worker 也成為高危人群，理由是他們遠離家鄉又處於青壯年，又沒有家庭在旁邊，知識水準又低，很容易去找小姐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自我保護，所以他們更容易感染愛滋病。就是這個簡單邏輯，「我的立意是好的，我關心你們啊！」這套敘述馬上就出來了。好，最近則是大學生，你們是高危人群，這是最新貼的標籤；尤其是大學生裡面的男同性戀，因為被勾引或者說趕時髦，所以開始有風險。在愛滋病領域裡有不少你說的例子，當然在其他領域還有，真的是挺多的。

何春蕸：除了愛滋領域就是性工作啦！好心人士的保護、拯救到最後都把人家工作者搞得很慘。

甯應斌：這問題可以再哲學性、抽象化一點來看，就是說，常有一種身分，你不清楚它，有這身分或許有這行為的人可能稍微受苦，但他的苦難可能無以名狀，因為還沒有很清楚的意識，他的身分還沒有被標出來。但是他的身分被標出來，這可能是他去爭取權力而來的，他平常承受的生活裡面被歧視、壓迫因此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清楚，他知道怎麼去處理它，但另一方面更清楚的是，這種痛苦可能也更尖銳，因為你越去爭取權利，可能遭遇到的反彈就越大。所以說這是會有兩面性的。我們從一個當事者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就好像一個人病了，他不知道是什麼病，他只是默默地痛苦，這是一回事；但是他如果知道這是什麼病，他開始干預這個病，那這個干預可能會造成某種痛苦的解除，但也可能產生另外一些副作用等等。這還是從個人來想這個問題，但是社會問題往往不是單獨發生的，其他的社會力量都會拉扯，當一種人群出了一個身分，爭取一種權利，他就會牽動很多其他事情跟運動，或者可能有更大的結構力量要使這種人被出櫃或者自己主動地去建構自己的身分。所以不能很孤立的去看這件事情。

黃盈盈：我還想再講一點，跟你這議題有點關係。有一股力量經常覺得自己是好心，這就是跟國際組織、國際資金的介入有關係的。因為愛滋病這一塊有很多資金進來，主要是全球基金的資金，那個資金進來之後對社群的發展，尤其是男同的這一塊發展，

影響非常大，包括活動的導向，因為國際要支援民間力量，中國政府你要跟我合作，一半的錢必須給 NGO，結果忽然之間、一夜之間出現了很多草根小組，本來我們 5 個人是一個機構的，明天我們就變成 5 個機構，這跟整個資金的導向是有關係的。可是，人家不是好心嗎？他們給你錢做事情啊！但是可能造成的後果就不是這個社群想看到的，可以說是問題的。

性工作這塊也類似。我一直在講香港嚴月蓮老師辛辛苦苦的扶持了 6、7 個小組，真是不容易，我們九幾年就認識了，她做事很低調的，但是很紮根在社區裡面，那幾個社群我都很熟悉，每周都一定要出去做外展，一定要到小姐那裡跟她們接觸瞭解狀況，包括她們確實遇到什麼困難，我們可以怎麼去應對等等很細很細的事情，很難做，真的很難做的。大概過了十來年吧，有 5、6 個小組發展起來。有一次開交流會，當時有一個 UN 系統的人說了一句話把你氣死，他說：「你們做這麼多事，早跟我們聯繫啊！早跟我們聯繫，我就幫你做成一個 best practice 的個案啦！就可以拿去國際上講了。」他就是這麼說，而且 UN 的指導方向就是屬於做國際倡導，沒有錢給那些草根組織做那些紮紮實實的社區工作，但他有錢讓你出國去會議上講話。他們是好心，但是經常的導向是讓那些做倡導的人被看見以及在國際上發聲，然後你的資源也會隨之而來。而那些紮紮實實在下面很辛苦做事的，現在就沒有資金支持她們；原來樂施會支持，但樂施會因為上頭的變動以及各種狀況，現在不支持了。國際上很多資金的介入會帶來一些要求，「我這個資金給你，那你就要做這些事情」。在這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種引導是蠻厲害的，會讓那些真正紮根的草根組織活不下去。

那次會議，全球基金的人也在，一直強調自己支持了三百多個小姐的組織，然後換我總結的時候，我說：「中國一共有、7 個小組。」她們就很生氣：「我們就已經支持了三百多個，你怎麼能說是 6、7 個呢？」但是，大部分那些組織其實就是為了專案資金而臨時成立的。最近十幾年來跟愛滋、性及性別有關的這種草根發展是值得好好分析的，包括它跟國際的力量、國內的力量之間的各種關係。

甯應斌：兩岸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我覺得大陸做所謂 sexuality 研究的好像就只有你們那機構。

黃盈盈：還有其他人。

甯應斌：還有嗎？那我們怎麼都沒有看到？

黃盈盈：不是機構性的這種。

甯應斌：我是講學術性的。

黃盈盈：如果不太考慮細的東西，做這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學有，裴諭新和丁瑜算是做這個，何式凝現在有一批學生在大陸...

甯應斌：何式凝現在在中山嗎？

黃盈盈：她不在，但她有至少 4、5 個學生現在在大陸的高校社會工作系工作。除了中山，還有一個在北京師範大學，主要是做性騷擾這一塊。

甯應斌：這個比例好像真的有點少。臺灣雖然有好幾間性別所，但是他們學生很多是做性少數議題的。

黃盈盈：按比例來說，那是很慘的，比較少。

甯應斌：我覺得，學院裡面沒有多少生產，這可能就會影響到未來的發展，對不對？在臺灣不一樣，現在民間開始對於政府有一點點影響力，所以才有同性婚姻的立法，對不對？這在大陸好像看不到苗頭，你們的運動基本上就是走國際資金的支持，對不對？然後主要就是愛滋病防治之類的。這個形態也跟臺灣的發展不太一樣。不過，在這樣受限下，好像應該還是可以有些策略或是可能發展，我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但是我感覺還是要去發展。不知道大家的觀察是什麼？王蘋你不是常常跑大陸參加拉拉營嗎？你有何觀察？

王 蘋：我有一個問題，我自己有機會碰到一些從大陸來的比較學術的學生。我一直覺得，其實以大陸來說，性少數的小組並不少，很多，光是拉拉營這幾年的發展，每一個地區、每一個省分、每一個小地方都有小組，而且不斷地在長出新的小組，那這些人有沒有想要在學術裡幹些什麼？我一直覺得我碰到的非常少，而且是少到很少，不像臺灣，臺灣好像全部人都往學術裡跑。我也不知道兩個地區會不會有區域性的差異，比如說在臺灣是不是大家都覺得只能在學校裡面發展，自己生活裡就沒辦法？我也不知道。而且臺灣又很小，隨便一個人厲害一點，講些什麼事，好像就變成大事件，可是大陸其實也做一些很厲害的事情，但是因為媒體沒報導所以就看不見，相對能見度也不一樣。然後我有一個不瞭解的地方想問，就是說為什麼大陸這些性少數不會想去學術發展？是因為他生活裡有其他的問題？還是怎樣？

黃盈盈：這跟大陸學術界的整體狀況有關...

甯應斌：學術界沒有給他發展空間嘛？！老師不指導呀！不敢指導呀！

黃盈盈：在高校裡公開出櫃的是華東師範大學的魏偉，他在社會學系當老師，他是在學術界以同志身分做研究的一個，我還真的問過同語她們有關學術界的拉拉情況，她們提了一下說實際上有幾個但是不太願意出來。整體上，確實是整個學術圈裡做這一塊議題的就不多，以公開身分出來做的就更少了，確實是這樣。在北京，如果你要進高校的位置，是有一套規定在那裡的，唉！反正學術界是挺悲慘的。這兩年會稍微好一點，包括學生對學術的興趣呀！然後國外有一些人回來，例如在人類學系，也來我們這裡開過會。最近幾年我感覺是多了幾個，但以後會不會更多，不太清楚，但現在的力量確實是弱。

何春蕤：我們談這個話題的時候，臺灣同學就覺得「哇！你看我們臺灣多好呀！我們學生好多空間呀！哇，可以學很多東西啊！很多這樣的老師啊！社會上支持度蠻高

啊！」可是我覺得這可能也要回頭去看一下歷史發展，因為在臺灣能夠搞得起現在這個局面，有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當初性這塊議題其實是從女性主義殺出來，女性主義原先就有學術的基地在那，然後以女性的角度、用平等的角度去殺出它在情慾方面的這一塊，才把空間打開來，讓其他的各式各樣的情慾主體能夠有發言空間。但是如果在大陸，女權這一塊沒有想要往性這個方向走，還只搞性別的話，那就不會有出路了，因為它就一直在性別這個領域按照二分的方法搞來搞去，性這一塊不會有任何的進展，而在性別的領域中就只會看到男強女弱的公式不斷地繼續上演而已。所以我覺得在大陸，特別是女性主義這一塊，值得觀察它會不會往下去打開更多發展領域。

黃盈盈：我還想再補充一下，這裡還有一個背景。有人會告訴你大陸做性議題的人很多，1994年的成立了性學會 **SEXOLOGY ASSOCIATION**，何老師、甯老師應該有接觸過其中的一些人，零幾年就有了兩萬多的會員。你要說人少嗎？不少，但是大部分是醫生以及做生意的。我在大陸做 **sexuality** 研究的時候，其實在理論脈絡上原先最主要對話的是醫學化的那一塊，也就是 **SEXOLOGY** 那個範式，他們開會我也不太願意去，但是人家又把你歸成是同一派的，你們都是講性的。但其實在理論脈絡上，我們對話的、想批判的就是這個醫學化的性。第二，我們本來也想和商業化的性對話，辯論辯論，但是現在他們都成了你的盟友了，在別人看來你們都是一批的。搞醫學的性學家很多，一大批，而且有 **certification**，有資源；然後搞商業化的性，天天有賣工具的過來找你合作，這些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現在搞得跟我們對話的只有女權主義一樣，而女權主義又把 **sexology education** 的跟我們都歸成一派加以批判，這也是蠻奇怪的。

王 蘋：我想問一下，你說搞商業的，那是？

黃盈盈：做生意的。

甯應斌：情趣、成人用品的。

黃盈盈：我們有很大的性工具的市場。

王 蘋：那是公開的嗎？因為在臺灣反而不行。

黃盈盈：很多，公開的。

何春蕤：成人保健，很有正當性，從各式各樣的保險套到情趣用品這些。

甯應斌：很多城市都辦過大展覽啊！

黃盈盈：我們人大附近就有好多，下次來，我帶你去。

何春蕤：比方說辦性文化節，大陸很多，每一城市都辦性文化節。裡面就會包括很多種

人參與，比方說有性歷史文物的收集者，也會有賣情趣商品的，也有賣威而鋼的。

甯應斌：以前性文化節現場都會放一個大陽具豎在那邊，兩個大睪丸，現在可能就比較低調...

王 蘋：我覺得這個好有意思喔！其實臺灣遠遠不及大陸的發展，我們看起來有學術，好像社會空間很大，可是這些商業的在臺灣是非常被貶抑的。以前還有一個商業團體已經把自己搞得非常高檔，要來找我們合作活動，說他在做教育，但他們處處碰壁，不能上廣告，也不准擺攤，就搞得很辛苦。我覺得這一塊跟大陸很不一樣。

黃盈盈：我補充一點，我對大陸的商業主義真的是又愛又恨。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他們推動的，包括情慾上的東西是他們在推動的，所以你還不能簡單的拿資本主義消費來批判他們，因為性觀念真的是他們打開了很大空間，比我們厲害得多。我去研究按摩的時候，他們的宣傳是從女性身體自主切入，我來給你做保健的，而且裡頭包括女性自慰的議題，當然他不會直接提自慰，而會說「我讓你很爽」。所以商業化其實把我們要宣傳的理念貫徹到了生活中，有時候商業化能幫你辦一點事，還幫你去跟公安打交道，所以有時候商業行為還蠻可愛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有的地方他們很討厭，所以真的是又愛又恨的狀態。簡單地說，現在很多人批判新自由主義，或者是批判商業化、市場化，我覺得也沒有道理，像在性這一塊，我覺得有它可愛的一面。

甯應斌：他們還支持過學術會議呢！就是性學會。當然這裡面也要提供一些空間讓他辦一些活動，還有一堆人希望因為參加這個會議而得到某種證照之類的。臺灣樹德大學所推動的性治療，上次就支持了性學會。

黃盈盈：治療研究是一大塊，諮詢治療。

丁乃非：我想回到 NGO 的話題。你提到福特基金會，讓我想到了兩個對照。一個是在印度，我的一些朋友談到其實他們長期是被福特基金資助的，這跟臺灣的資金來源有點不一樣，也就是美國其實會重點資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臺灣不在裡面，可是臺灣也會拿到的一些錢有可能集中在同志團體。第二個，我覺得 1960 年代以後有一些自主的小基金會，那些基金會其實會比較不同於國家型的、全球性的跨國基金會，那種小基金會曾經是相對來講比較尊重你在做什麼樣的運動、你怎麼做，然後它給你錢，由你自己決定怎麼用。可是過去 10 年，連這種基金會都在改變，也就是整個美國的經濟狀況在轉變，它們也越來越要服從於政府的政策，以至於它們開始對自己能夠支援的地區以及怎麼要求被補助的對象，比如說怎麼寫報告，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嚴格。這個部份我覺得很有趣，有一些也可能是新一代女性主義的基金會，跟在地所謂民間的合作，其實是脫離不開世界局勢的轉變跟經濟狀況的。

黃盈盈：我很快的回應一點，這個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現在大陸也開始出現類似的情況，有一些 LGBT 性少數的組織前幾年開始，原來很草根的小組織，現在開始要做 5 年規劃。他們就愁了！我該怎麼寫？還要寫英文的 5 年規劃！5 年目標是什麼？策略是什麼？方法是什麼？產出是什麼？如何評估？

丁乃非：然後你報告規劃時還要跟委員們交流以便配合對方要求。

黃盈盈：evaluation 的時候也要來報告了，這一塊學得很快。

李 雪：若在大陸做 sexuality 研究，除了跟女權還有跟醫學和商業上的性團體有一些對話之外，還有什麼樣的群體是您能夠經常學術討論或者交流的？或者說，有什麼樣的策略？或者說，如何規劃去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到這樣的討論感？哪怕是吵架...

黃盈盈：後面有機會我們還可以細談這一塊。但是我現在簡略地說一下，因為這跟我們在做的事情有點關係。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會做一些網路建設的事情。另外一種活動是，對性議題感興趣的人坐在一起交流，雖然還是從自己的圈子開始，但是你會慢慢擴大，或者說，性工作的跟做 LGBT 的多溝通，或者跟虐戀的多溝通，但是還是比較偏內部的對話。或者說像我，因為我在社會學系，所以我會在社會學的一些場合發言發表，很多人就說：「你幹嘛不寫時事評論？你幹嘛要發表那些文章？」那些文章恰恰是給那些不會關注性議題的學術派看的東西，所以這個就變成，你是在跟社會學界的人交流，但是把性的議題帶進去，你是在跟圈外的人對話。魏偉就特別關注這一塊，所以他就老是說，我們應該在比如說社會學年會、人類學年會這些地方講性的議題，就是跟其他不關注性議題的人講性的東西，那也是一個策略。主要就是看你在一定的時期想跟誰對話？是想內部討論多一點？深入一點？還是說想更多的跟外面的人進行對話？這兩個方向我覺得都蠻重要的，只是說一個是你的興趣點在哪裡，還有一個是對話點會不太一樣，但是整體上性研究的人確實太少了。另外就是你自己的研究要做得讓人家沒有詬病，方法什麼的要站得起來，讓人家覺得你做得挺好的，他就會關注你在做什麼主題。

甯應斌：我們前天剛好辦一個跨性別的座談，我就想到，大陸有沒有跨性別議題的什麼發展？

黃盈盈：跨性別的國際的資金還沒進來，但是我知道現在他們的活動顯著度是比以前大得多。

李 雪：最近資金在流向跨性別...

甯應斌：就是在同志組織下面做一些倡導的項目。

黃盈盈：我知道亞促會在做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研究，所以國際組織的錢也開始進來了。

甯應斌：我們現在結束，謝謝黃老師的分享。（討論部份騰稿：邱軒琦）